

馮承鈞譯

西域南海史地
考證彙纂三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學
社
PDG

馮承鈞譯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三編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91448C)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三編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馮承鈞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 胡達聰 尤惠民)

四二四六上

張

PDG

跋

研究明末清初的史事，有一部份很重要的史料，尙未經人廣爲蒐輯。我所說的，就是耶穌會所藏、來華傳教士的報告、紀錄、著作、信札。歐洲學術之開始輸入中國，中國文獻之實在輸入歐洲，可以說就是這些耶穌會士的功勞，此外還有些罕見的紀錄，就中若湯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的「歷史記錄」 (Historica relatio) 曾言順治如何得疾致死。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 同利類思 (Buglio) 是親見過張獻忠的人，他所撰的「張獻忠記」 (Relação das tyraniás obras por Ch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ão de China, em e anno 1651) 必定有些世人未詳的事蹟。張誠 (Gerbillon) 同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可以說是締結尼布楚 (Nertchinsk) 條約的要人，他所撰的八次北行行記 (見Harde書) 也是重要史料。如是之類，舉不勝舉。其中有箇卜彌格 (Michel Boym) 曾奉永歷太后同太監龐天壽致

教皇及耶穌會統領書赴羅馬，尤爲歷史中之一異跡。我在景教碑考中曾說過，「計其東西往來之年，幾與玄奘遊年等，不幸則又與無行同。而其犯冒險阻、仗義奉使、不特爲明之忠臣、兼爲教會之殉教者。」我當時就想廣徵其人之事蹟，可惜材料不易得。今檢本年通報，知沙不烈（P. Chabrie）撰有專書，伯希和對此書頗有補正，沙不烈書尙未見，茲先將伯希和的補傳轉爲漢文。（原文見一九三四年通報九五至一五一頁）耶穌會士幾盡有中國式的姓名，此編中凡有這類姓名可考者，皆著其漢名，餘則仍錄原名。又如書名，我以爲亦有完全鈔錄其書題之必要。加以關涉的語言甚多，尤其是荷蘭葡萄牙等文，我不敢強作解人，故錄之以待識者。繕校既畢，附識翻譯此編緣起於此，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日馮承鈞識。

目錄

「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評註.....	一
蕁麻林.....	六〇
蒙哥.....	七九
四天子說.....	九三
卜彌格傳補正(Michel Boyrn).....	一一五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三編

「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評註

見通報一九三〇年刊十二至五六頁 伯希和撰

巴爾托德 (W. Barthold) 君的佳作「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Turkistan v épokhu Mongol'skago našestva) 是於一九〇〇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的。已經有好多多年，覓不着這部書了，又因為原書是俄文，所以有許多西方學者未能參考。此次 E. Denison Ross 君同 Gibb Memorial 的董事們，將原著者重新修改的本子譯為英文，這是應該祝賀的。英文譯本僅將一九〇〇年俄文本第一冊之諸東方語言原文刪除。^{註一}

註一 鈞案英文譯本題曰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1928.

我欣然將這部材料豐贍的著作重讀一過，看此書一至六三頁所包含之加以鑑別的參考書目，同著者所撰「成吉思汗所組織之蒙古帝國的大勢。」他的內容實在比他的標題所披露的多得多。

回教撰述之採用，也表示一種範圍極廣的調查。著者此外當然引用迄今不甚佳的蒙古文著作，同比較很優的漢文著作。不過除開漢學家以外，別人所能參考的漢籍，祇有些片斷材料，而且這些斷篇，除開修道院長 Palladius 的譯文外，其他譯文皆有很多缺點。

著者所轉錄的東方名稱很忠實，可是有些名稱，我以為寧可用別的寫法。比方將玄奘寫作 Hsien-Tsang（二頁七〇頁等頁）不應用 i，英文應寫作 Hsien-tsang，法文應寫作 Hsien-tsang，契字並無顎音，又如成吉思汗的名字鐵木真，第一箇韻母應作 a 或 e，與其寫作 Tamuchin，不如在英文譯寫中寫作 Temuchin，倒與 Tamüin（或 Temüin）更為相近。又如那顏（noyan）是波斯文同漢文的對音，比此書所用的 noyon 更好。此書還保存 Qudatku Bilik 的寫法，我不明甚麼緣故。

公公道道說，我對於此書純屬回教撰述的部份，幾無何種指摘的地方，可是在蒙古文同漢文兩方的事實同名稱，我想提出若干考證，以供著作者的指正。

三七頁同其他諸頁：從前我同著者一樣，也同衆人一樣，皆說蒙韃備錄的撰人是孟珙，可是王國維業已證明其非，其撰人或是趙珙，可參考通報一九二八及一九二九年合刊，一六五至一六六頁。此外著者在本書四六〇頁所採蒙韃備錄的記載，其事並與成吉思汗無干，因爲一二二一年時，他在西域回教諸國，宋使從未在燕京見過成吉思汗。原書所說的是成吉思汗留在燕京的部將木華黎（*Mugali*）著者同 *Vladimircov* 在他所撰的「成吉思汗」書中一樣，皆爲 *Vasil'ev* 的譯文所誤，因爲譯文將木華黎的「國王」官號譯作 tsar（察罕。）

三八頁註二：應讀若：黑韃事略同皇元聖武親征錄，現在並證明標題中原無「皇元」兩字，僅稱聖武親征錄而已。可參考通報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合刊，一六九頁註一。

四三頁：海山汗（一二三〇八至一二三一一）用英文譯寫，應作 Hai-shan，或還原

作漢語外的寫法 Qai-san，而不應作 Kai-san。西藏文固然有一種晚見的寫法作

Haisan（參考 Huth 撰蒙古佛教史第二篇三五頁）可是並不可靠。

四四頁：Hyacinthe Biçurin 神甫所譯的，並不是元史的節本，乃是最先四汗的本紀。不幸這位神甫在人名地名方面採用了乾隆時元史語解改訂的名稱，致使他的譯文成爲無用，並且時常使 d'Olsson 同 Berezin 有所誤會。

四五頁：拉施哀丁（Rasīdu-'d-Dīn）與聖武親征錄相近的地方，比較一二六九年的元史還要多。拉施哀丁或告訴他蒙古事蹟的那些人，所採用的蒙古史事，必定是代表漢譯聖武親征錄的原本，至若元朝祕史所代表的，另是一種傳說，內容頗異。五一頁同二八八頁：說 bakhshi 是本於梵文 bhikṣu（比丘），不甚可靠。我們現在以爲此名是漢語博士兩字之對音，可參考 Laufer 撰文，見通報一九一六年刊四八五至四八七頁（五五七頁的註子大誤）同我在亞洲報一九二五年刊上冊二五四頁中的說明。這箇漢語名稱很流行，他在日本語中，不僅有漢和的讀法 hakushi，而且有完全日語化的讀法 hakase。

八二頁：漢文「那密」兩字，通常不能還原作 *Namik*。難道阿刺壁語 (Arabe) 的實在讀法不是 *Nāmīdh* 麼？

一一四頁註四：*Ta-mo* 應作 *Tu-mo*，漢語「獨莫」兩字假定的原名，作 *Tughmag* 或 *Tughmag*。因為中國人常將突厥字發聲之 *t* 聽作 *u*。至若晚見的 *Tūm* 寫法，祇能本於中間喉音之刪除。（參考唐時對於蒙古從前的秃兀刺 *Tughla*，今土拉 *Tula*，水之「獨樂」譯名，見上引通報一一一頁。）至若 *Tughmagh* 在 *Tūm* 裏面喉音收聲之喪失，可以上溯到中世伊蘭語沒有 *-gh*（或 *-g*）之一種寫法。一六三頁註一：漢語「渴塞」假定是 *Karsak*，遷就可以說是 *Kassak*。若說他的對音是 *Kāsān*，則很難承認。或者漢文譯名有誤，我現在還未見着滿意的答解。一七〇頁：*Öināykath* 同 *Jinājkath* 似乎一樣近類真相。

一九七頁：關於四大國之判別者，可參考拙撰「四天子說」見通報一九二三年刊九七至一二五頁。

一二三二頁註二：漢譯「摸胡壇」一名，並不如 *Taufar* 在「支那伊蘭」五二二

頁中所言之明瞭。其原名好像是 *Maḡnūdān* 或 *Maḡnōdān*，可是很難採用 *Laufer* 之說。說他同 *Mobedhān*, *Mobedh* 的構成一樣，案 *Mobedhān* 之構成，固然是 *Mo-bedh* 又加表示多數之 *-ān*，至若 *Maḡnūdān* 好像是由 *Maḡnu* 又加 *-dān* 構成的。一二三頁註十二，漢譯 *danīšmand* 作「荅失蠻」，曾經元代碑文中蒙古語寫法之 *dašman* 所證實。

一五七頁註五：與其用 *Tak*，似以用 *Tig* 爲優。後一字此言王，今日已見畏吾兒語著錄（就中可參考 F. W. K. Müller, *Uigurica* II, 索引）。

一六一頁註一：我箇人以爲與其作 *Sabuk-tegin* 或 *Sü-beg-tegin*，不如作 *Säbäk-tegin*，或 *Säbük-tegin*。關於古突厥語固有名詞中之 *Säbäk*（就是著者之 *Sebük* 或 *Sevik* 鈞案唐譯作娑匐）者，可參考通報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刊二四三頁。此名男女並用，至若等如 *Säbäk* 之 *Säbük* 在 *Qutadgha Bilig* 中已見有 *Säbük* 同 *Sävik* 的著錄。（參考 Radlov, IV, 502, 506）von Le Coq 君也贊成 *Sävik-tegin* 的寫法。（*Türk. Namen und Titel in Indien*, p. 1.）

二六九頁：著者在此處同在三〇八頁三三三頁皆說 *Paighū* 似應改作 *yabghū*（葉護）此事或者可能。然而不應忘者，在蒙古語固有名稱中，曾見有「伯忽」的寫法，此「伯忽」二字，通常可以還原作 *Baigu* 或 *Baighu*。又案突厥語中有一箇與鷹相類的鷲鳥，名稱 *biǵu*，而突厥語同蒙古語之固有名稱中，使用獵鳥的名稱，頗不少見，這是世人所知道的。

二八四頁註七：貨幣之 *yagha* 的寫法，或者洵如著者的假定，是 *yaghan*（此言象）的省寫。（參照 *Täimür-toghan* 名中之 *toghan* 作 *togha* 之例）然而或者也是一種古寫法。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古畏吾兒語名象曰 *yanga*，而 *yagha* 應是一種無鼻音的寫法。（參照亞洲報一九一三年刊上冊四五五至四五九頁）關於用鼻音同不用鼻音的寫法，可引證漢語「樣磨」譯名，此名所指的是 *Yagma* 部落，而譯名則假定是 *Yagma* 的對音。（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三五頁）還可引證我對於滿洲語所設想的一種假定，滿語稱漢人單數曰 *nikan*，複數曰 *nikasa*，這箇名稱是由蒙古時代 *Nankiyas*, *Nangkiyas*（南家）轉化而來的。（亞洲報一

九一三年刊上冊四六五至四六六頁）

二八六頁註二 Melioranski 所研究的阿剌壁語突厥語字典，今知爲 Ibn Muhannā 所撰，不知何故著者尙謂佚撰人名。arslan 的解釋，已見 Melioranski, p. 057 頁中，或是著者以爲這是新說，遂以爲他確實可靠，因爲在 Ibn Muhannā 書中兩見 arslan 的著錄，可是寫作 arslan (p. 067)。遷就着說可以說是前面 qaplan (qaplan) 一字之訛寫，如此看來，我們不可遽然認定有些突厥人的十二屬中有箇「獅年」。（雖然 Marco Polo 有獅年的著錄，可是他常將虎作獅，比方以虎符作獅符之類，好像是受了波斯語 šēr, šir 等字的影響。）在孔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一九二一年出版的 Ibn Muhannā 本中，對於虎年，未見有用與 bars (虎) 意義相同的 qaplan 同 arslan 等字者，所以 S. E. Malov 在 Zapiski Kollegii Vostokovedov 第三冊中，未曾討論這種問題。現在我手邊也無 Kašghari 書關於十二屬的材料可以參考。Ibn Muhannā 的十二屬名錄是出於一〇二七年紀錄的，其中將魚 (baliḡh) 代龍，此處或者有一箇有利於 Poppe 所提出的假定之小小根據。他

以爲 Qazvini 書中所著錄蒙古語來歷不明的鱷魚名稱 bslqun (basalqun) 是蒙古語 balgasun (魚) 之字母顛倒的寫法，而突厥語之魚的名稱則作 balıq。(亞洲報一九二七年年上冊二八九頁) 世人也可仿照他的假定，解說來歷不明的 Balas-aghun (八刺沙衮) 的名稱。從前也有人提議 (如 Bretschneider, Med. Res. I, 18) 以爲這箇地名就是 balaghasun 之字母顛倒的寫法。(蒙古時代的寫法如此，舊蒙古語作 balghasun，此言城。) 突厥語相對之稱則作 balıq (城) 然而這類的假定是很不可靠的。王國維 (觀堂集林十四，三至五頁) 也曾試爲解釋八刺沙衮的名稱，以爲就是唐代的「裴羅將軍」城 (參照沙畹 Chavannes 撰西突厥史料十頁) 可是「裴羅將軍」的對音應是 Bolasāngün 或 Bulasāngün。三二七頁註二：著者以爲此處之「州」原名非突厥語名，乃是波斯語名。有不少名稱固很難說他是原出阿爾泰系語，或伊蘭系語，然在此處除有反證外，我以爲此字是出於阿爾泰系語的。突厥察合台 (jaghatai) 語有一箇字，曾經 Radlov (III, 2044) 譯寫作 Yölgeä 者，他訓爲「川谷、或山足有水草的平原」而將他分解爲

köi + ga 案 köi 是一箇突厥字，義爲荒野，曾見噶昆 (Orkhon) 河諸碑文著錄，而在蒙古語中寫法與意義皆同。^{註一} Vullers (I, 602) 曾著錄有 kölgä 或 Yülgä 他的定義同 Radlov 一樣，他也說是出於 köi。此二字典編纂家的定義，皆是採自 Abuşğa 書的，則可見 Vullers 僅在一部突厥字典中認識此字，而非波斯語字。可是 Abuşğa 所誌的荒野作 köi，而別一字寫作 jölgä 或 jülgä，而不作 kölgä，並未說此二字有何種關係。^{註三} 其實我以為應該將 köi 同 jölgä 分開，此二字皆非波斯語字。第一字或者獨爲突厥語字，而第二字或者原是一箇蒙古語字，因爲寫荒野作 köi 的蒙古語，有一 jülgä 字，訓作草原，此字顯然就是 Radlov 之所謂 kölgä。况且用 j 發聲，而不用 g 發聲，曾經下面兩種語言所證實：突厥 kuär 語之 yölgö，此言「澤中之草丘」；乞兒吉思 (kirghiz) 語之 jülgö，此言「小谷」(Radlov, III, 451; IV, 186) 可以例已。Vullers 同 Radlov 所引察合台語之 kölgä，好像必須改正爲 jölgä 或 jülgä，此字在蒙古語中很古，因爲在元朝祕史第一四七則中寫作 jölkä，而訓爲川。^{註四} Pavet de Courteille (p. 298) 在 kölgä 條下，除訓爲「灌溉的平

原」外，又訓爲「城市的區域」Vámbery 在 *jölga* 條下訓義亦同。如此看來，他們在 Vüllers 以爲有兩箇字的地方，認作一字。一箇是訓爲灌溉的平原之 *jölga*，一箇是訓爲疆域之 *jölga*。Vüllers 對於後一字，取材於 Quatremère 所撰之 *Notices et Extraits*, XIV, 1, 59. (Quatremère 讀作 *jülkä*) 很多，因爲此字自蒙古時代以來，常見於波斯載籍，甚至並見於 Bābur 的「記錄」之波斯文譯本。（我現在在突厥語原文中尚未檢出，或者其中未用此字。）然而又可證明這是一箇古蒙古語著錄之字，考所謂 *Darmabala* (*Dharmapāla*)「寡婦的聖旨」是用八思巴 (*phags-pa*) 字母寫的，有人考訂他的年代是一三〇九年同一三二一年。然而也可說是一三三二年，這道聖旨說有一箇「保定」*khölga*，此字經 Pozdnéev 在蒙古字典中檢出，就是漢語「路」之對稱，同一寫法及同一訓義，並見於一三二四年之蒙漢文聖旨碑。註五復次尚有未曾刊布之一三六二年漢蒙兩體大碑文，是用畏吾兒字寫的，其中言有「*Isina* *ny* *jölga*」，這就是元代之亦集乃路。Marco Polo 之 *Ecin* 今之 *Elsin-ghol*，此字連同「路」的訓義，曾用 *khöl-kha* 的寫法，移植於西藏語中。註六